

# 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POL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POL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POL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美] 斯蒂芬·K.怀特 著

孙曙光 译

赵进生 陆 丁 审校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 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美] 斯蒂芬·K.怀特 著

孙曙光 译

赵进生 陆 丁 审校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2-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 [美] 怀特 (White, S.K.) 著; 孙曙光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12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Pol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ISBN 7-5382-7194-5

I. 政… II. ①怀… ②孙… III. 后现代主义 政治理论 理论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778 号

Pol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110003)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 沈阳六〇六所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16 千字

印数 1-3500 册

定价 18.00 元

作者 斯蒂芬·K 怀特

译者 孙曙光

审校 赵进生 陆丁

责任编辑 严中联

技术编辑 代剑萍

责任校对 吴向前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版式设计 熊飞

## 内 容 简 介

后现代主义曾经激发了巨大的争论,且今日依然,尤其是现在,它已经扩散为一般性的话语。有人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诸多原则,比如它对种种元叙事的基本性抗拒,比如它让人吃惊的解构性,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正在从后现代主义的创新性视角当中受益。在本书中,斯蒂芬·K.怀特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责任的含义的思考方式:一种是流行于现代主义论述中的视角,另一种则流行于后现代主义论述的视角当中,从而廓清了穿越后现代疑难的道路。以此为导向,怀特探究了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和哈伯马斯以及那些“差异”女权主义者的作品,想要借此说明后现代主义何以能够给当代的伦理—政治反思带来某种信息。

怀特认为,必须用一种更具肯定性的“他者”指向来补充后现代主义广为人知的反抗和破坏立场。这一指向采取了某种“轻度”关怀(Lightness of care)的形式,这一形式出自一种矛盾情绪的传播,在这种矛盾情绪中,因确定性丧失而来的悲哀和因差异而来的欣喜纠葛在一起,难解难分。在结论章节,怀特考查了这种修正了的后现代主义视角是如何影响到我们对正义的考虑的。

献给哈莉迪亚

## 前 言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既引发热情又引发质疑的术语。热情来自从现代性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多元暗示；质疑来自它的作风，因为后现代的思维模式有时似乎是，对于任何“现代话语”连续性的中心问题，它都醉心于拒绝问津。这种张力被围绕着后现代性的概念的复杂性强化了。例如，它似乎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沿着艺术、建筑、文学到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学的方向延伸；同时它又与其他极富争论性的概念，如“后结构主义”紧密相关。我试图在这一富有张力的领域勾勒出一条线索，主要意在阐明伦理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在本书开篇，我就把我认为的当前伦理政治—反思方面所要应付的一些后现代的基本疑难罗列了出来。我指的是“第一章导言：后现代疑难”，它表现为四种现象：对传统的元叙事渐增的不信任，关于社会合理化所造成的新问题的逐渐警觉，信息技术的爆炸，新社会运动的出现。然而，对这些疑难的阐明只不过[ix]<sup>1</sup>提供了一种说明，一种具有明显的路标功能的说明。可它仍然没有告诉人们如何通过路标，或者，毋宁说，如何通过思考这些疑难而得出结论。答案在第二章开始出现，在这一章里我会作一些辨析，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在围绕后现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的重复是显而易见的。辨析出的差异将在论述具体争论的章节最先得到详尽阐释。这些争论是在有关后现代主义斗争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以哈

---

1. 方括号中的数字为原著页码，方括号所在之处为原著中该页码所标之页结束之处。全书同。——译者

伯马斯为一方,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关于是什么推动了争论中的每一方在道德、政治、美学方面进行根本反思,我区分出了“对行动的责任”和“对他者的责任”这两个不同的含义。与这种区分相关联的是语言上的差异:它的“协调行动”功能和它的“揭示世界”功能。弄清这些差异,以及为何争论的双方对此观点不同,是认清在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什么才是危险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我怀疑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会陷在尼采式讥笑的旋涡里。他或她会立刻注意到这很有讽刺意味:在一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书的开篇,作者竟然断言,借助于形而上学—本体论这一对堂皇的二元特性,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澄清。然而,我对这两组二元特性的运用并不包含任何强烈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主张。这些特性不过是我用来解释我们(这里的“我们”主要是指自由的、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当前的一些困境的方案中的最基本术语。这些特性的“有效性”只被展示到足以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生活中的挫折和不满的程度,与此同时,至少比较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推理模式。

深思后现代疑难的错误方式是,以损害一方为代价,片面地强调这些特性的另一个方面。而在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这恰恰是大多数情形所采用的战略特征。在这本书里,我的全部努力旨在寻找行动和思考的方式,以使责任的两种含义和对语言的两种理解[x]保持有益的张力,而且不许任何一对概念支配另一对。<sup>2</sup>

“对行动的责任”的含义和为协调行动而对作为媒介的语言的

---

2. 我想要论证的,同时也是理查德·罗蒂所提出的这样一类张力,彼此之间可能有些重叠。他写道,我们的“最终词汇”不应该像铁板一块那样死板地供我们使用,而是更应该展现彼此影响着的“责任感”与“应对有限性方法”之间的张力。(在这样的方法中,我认为有限性已经卷入到对他者的责任中了。这样的方法在第四章变得很清楚了。)罗蒂对这样特性的思考是相当有趣的,但是与伦理—政治问题相关的方式却是不明了的。所有这些问题仅仅通

理解,构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学思考风格的深层结构的一部分。这对对照的概念构成了对这一倾向的挑战。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我想说明,正是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我们发现了这种挑战最富洞察力的原始陈述。在阐明海德格尔著作的内涵的过程中,我不仅注意到了当前后现代立场的连续性,而且也注意到了其不连续性。我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出现了一些关于他者的洞见,而对这些洞见,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并非总是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同时,海德格尔留给我们的关于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观念,从最乐观的角度看是模糊不清的,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灾难性的。因此,海德格尔的遗产既具有“对他者的责任”的真知灼见,而同时他关于“对行动的责任”的观点则有严重的缺陷。第五章更直接地关注这样一些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他们全神贯注于这一个问题,即他们的对于“他者”的反应的概念化是如何重新定位伦理—政治行动的。这里的研究导致了一种暗示,即对他者的某种“轻度”关怀的观念,为这样的一种再定位提供了基础。在第六章里,为了纠正和进一步发展那些得自海德格尔和后现代派的洞见,我求助于“差异”女权主义关于对他者的培育和关怀的分析。

始于第五章、第六章的关于新的实践倾向的思索,[xi]在第七章成为更为集中讨论的对象了。有待解决的是正义概念的重新界定问题。言外之意是为了说明我们根据后现代疑难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再思考的时候所要运用的种种指导原则。既然我对正义的分析能达到自圆其说的程度,其他人就应当由此受到鼓舞,也作出同样的努力去分析其他观念。

---

过此方在彼方上描绘特征,并把这些特征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天真地进行分配,从而把问题归于沉寂。于是被分为两类的词汇就毫无疑问地被放进了两只密封箱。这种分配对于公众生活不会产生任何难题;而这样的问题正是我所要探究的,参见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尤见 pp. 68—69.

以下的几句话是关于本书不具有的功能的说明。它并不有意成为一个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出现的全部主题的通览。这需要一本篇幅更大的书；本书是一本针对特定主题的小册子。它并没有涵盖所有的与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然而，对一些像让·博德里亚这样的思想家的忽略并不意味着他们关于文化、社会、政治分析的思想对我们毫无用处。<sup>3</sup>这不过是我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一些相关的斗争中，不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使得伦理和政治主题的论述特别地突出出来，并形成了一种时尚。最后，本书并不是一本生动描绘那样一种政治学的精美图画的书，这种政治学比较敏感地对待后现代关注的问题。尽管我在最后一章对此作了探索，但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出一个部分地替换伦理—政治反思的传统方式案例。如果这一努力是成功的，那么，下一步就会更具体地观察，如果改变一些特定的政治过程和体制的话，那么这一与众不同的视角可能会意味着什么。[xii]

---

3. 博德里亚著作的一些内涵在以下著述中有所揭示：Timothy W. Luke, *Screens of Power: Ideology,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Informational Socie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和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 鸣 谢

这本书是因我对后现代派和他们的批评者对待彼此的方式不满而诞生的。我的研究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可行的思考这种后现代争论的方式。最终，此项研究获得了弗吉尼亚工学院和州立大学的人文学科项目中心的支持。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使得我能够有一学年（1987—1988）的时间呆在法兰克福大学，最终获得对海德格尔的理解。我特别要感谢哈伯马斯的好客，尤其是他对我的计划的热情支持。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组织同样值得特别的感谢。它也许是一个大学教师最想找到的一种基金了。在那一年里，法兰克福的许多人对我的思想的演进都作出了贡献，他们包括理查德·伯恩斯坦、亚历山德罗·费拉拉、瑞纳·福斯特、克里斯·雷提雷斯和理查德·沃林。

1989年春季，洪堡基金会慷慨地邀请我前往德国，参加在波恩召开的海德格尔会。会上的发言报告有助于我在第三和第四章里明确地表达一些思想。1990年春季，在我的手稿接近完成的时候，我向伦特大学的“西方历史和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跨[xiii]学科研究生课程，提交了一份题为《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论文。这对于我全部观点的最后精确提炼是极有助益的，为此，我要感谢道格拉斯·托格森和罗伯特·卡特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不惜耗费时间阅读和评论这本书不同章节的人有汤姆·杜姆、伯尼·洪尼格、埃塞尔·洪耐兹和丹尼斯·斯密特。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个，在我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在引导我进入海德格尔的思想方面给了我巨大的帮助。J.唐纳德·穆恩读了几章后，给我提出了

广泛的而又价值无量的意见。弗莱德·多米尔对我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忙于这本书的写作的时候，我仍然乐于为他编辑《纪念文集》。那些阅读了我的全部手稿的人为本书的修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是：我的同事提姆·卢克、比尔·康诺利和瑞蒙德·盖丝。对所有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的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埃米里·路斯对我的帮助再大不过了，对本职工作极为胜任。政治学系的秘书们，马克辛·瑞利、苔芮·肯格瑞、凯姆·海德哥和凯西·阿克思，他们在把数不清的草稿整理成正式文本的工作中，总是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一贯的耐心。我的研究助理，斯科特·麦德森和海伦·汤姆森，给了我各种各样的帮助。最后，我很感激我的家人：帕特、莱德和凯姆对我的深切支持。

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发表在《政治理论》第16期(1988.5)第186—208页《后现代主义和政治反思》一文中。第三和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发表在《政治理论》第18期(1990.2)第80—103页《海德格尔和后现代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困境》一文中。第七章的部分内容非常早的版本在《国际现实》第7期(1987.10—1988.1)第306—319页的《正义与后现代的问题性》一文中。我也非常感激，霍夫施塔德主编的马丁·海德格尔的《诗、语言和思》(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一书第198—199页的“语言”部分获准转载。[xiv]

# 目 录

|                            |     |
|----------------------------|-----|
| 前言                         | vii |
| 鸣谢                         | xi  |
| 第一章 导言：后现代疑难               | 1   |
| I. 对元叙事渐增的不信任              | 5   |
| II. 对社会合理化之危险的新警觉          | 8   |
| III. 新兴信息技术                | 9   |
| IV. 新兴社会运动                 | 11  |
| V. 初步说明                    | 13  |
| 第二章 理解现代—后现代张力             | 15  |
| I. 战线                      | 15  |
| II. 两种责任                   | 21  |
| III. 语言的两个维度               | 25  |
| IV.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            | 31  |
| 第三章 海德格尔留给后现代主义的模糊遗产       | 35  |
| I. 政治、意志和主体间性              | 38  |
| II. 海德格尔和后现代政治学            | 48  |
| 第四章 海德格尔与对他者的责任            | 63  |
| I. 有限性与行动                  | 63  |
| II. 他者思想                   | 73  |
| 第五章 “从这种笑和这种舞蹈而来,或者在其之后……” | 89  |
| I. 德里达的责任重置                | 90  |

---

|                     |     |
|---------------------|-----|
| II. 体验日常生活之崇高       | 101 |
| III. 可承受的轻度关怀       | 107 |
| 第六章 “差异”女权主义与对他者的责任 | 113 |
| I. 女权主义关怀的意义        | 115 |
| II. 从亲密的到伦理—政治的     | 121 |
| 第七章 重思正义            | 135 |
| I. 一种新的多元正义观        | 137 |
| II. 非正义的诸现象         | 143 |
| III. 培育他者和限制他者      | 147 |
| 第八章 结论              | 173 |
| 索引                  | 175 |

## 第一章

### 导言：后现代疑难

怎么就叫“后现代的”了？或者，什么叫以“后现代的”方式思考事物？可能的答案其实多种多样。“后现代”这个术语（以及它的派生语汇“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被用在艺术、建筑、文学、哲学、社会和政治学的大量现象中，以及在上述各领域中所提出的主张里面。当然，在这诸多的领域中，一个人决定将何者视为重要而加以强调，这就取决于个人的利益和意向了。无数讨论早已存在，试图要把各种冠以“后……”的事物的范围作一综述；而我则想直接勾勒出一些特征，以便那些主要是关心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人能够获得一点初步的着力点。<sup>4</sup>

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把后现代的思维和行为分成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就很有助益了。<sup>5</sup>不过，这种区分仅仅是粗线条的，因为，[1]至少，所谓“后现代”就意味着要远离或者反对一点什么现代事物。当然，不管怎么说，总会有一些思想家的质疑和反对比其他的思想家更深入，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上更具激进的锋芒。在各种

---

4. 许多有益的评论见诸于一些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专文中 *Cultural Critique* 5(Winter 1986-1987)和*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No. 23(June 1988); Andrew Ross, 编,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Wolfgang Iser, *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Weinheim: VCH, 1987),以及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9),ch. 3.

5. 参见 Hal Foster, "Postmodernism: A Preface," *The Anti 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1983), p. xii.

后现代思想中,最不具有对抗性的形态也许可以从很多在那种在美国被看成是后现代建筑的东西中看到。后现代建筑所主要反对的其实是现代主义建筑中的一个具体学派——国际风格。这种新立场,按最不济的那种说法,使得对建筑装饰的接受变得更广泛了,同时还形成了一种要把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风格结合在一起的追求。不过,甚至就在建筑学内部,也还存在着一种更具对抗性的方法来解释“何为后现代”,比如,更彻底地质疑现代建筑所奉行的主要原则,更彻底地质疑建筑学与来自政治、经济系统的支配性指令之间的那种标准的关联方式。<sup>6</sup>

当我们从建筑学转向哲学和社会理论时,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之间力量上的不对称就颠倒过来了:现在,对抗模式这一翼才是更加强大的一翼。一个原因就是,被哲学家(如福柯和德里达)所发展起来的那种得到了广泛传播的后结构主义方法,似乎要求着那些运用这种方法的人永不停息地对现代性的各种基础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批评。而也正是这种更具对抗性的后现代哲学思考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受到后现代哲学家攻击的现代性的基础(或者深层结构)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像气球一样膨胀成一个跟“后现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样巨大的问题。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与伦理学和政治学最直接相关的点上,那么还是可以很容易地勾勒出一个我们能管得过来的部分的。受到后现代哲学家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人与世界应该处于何种关系的问题上,虽然有种种可能的答案,现代性却明确地只把重点放在了其中的一个上面。那种关系的开端可以清楚地早期的现代思想家(比如笛卡儿和霍布斯)那里看到。作

---

6. 关于更为激进的后现代建筑概念到底有什么内涵,一个有趣的尝试是: Bernard Tschumi, *Cinéma Folie: Le Parc de la Villet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87)。而对那种更靠主流类型的后现代建筑所作的总体说明,则见: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h. 4。

为个体的主体被设想成是某种相互隔绝的思想和意志 而它的天职就是清楚地了解世界,并把世界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2]从而使之为人类的目标服务。德里达认为,现代世界处于理性的强制之下,即万事万物都强制给出理性的解释;或者,如福柯那样,更不客气地把这种强制称之为“审问一切”。<sup>7</sup>这种现代对于理性的追求,着意提高人类意志和控制能力,不受限制。在20世纪,这种追求最终以“全球秩序之意志”显现自身。<sup>8</sup>

对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上述理性和意志的组合成为必要的前提。正如那个世纪的批评家们早已清楚地看到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侵蚀一切传统,清算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合理化逻辑(logic of rationalization)。此外,资本主义的逻辑与物质和道德进步的启蒙信念交织在一起。现代世界的合法性因此就一面将自身确定在“无限繁荣的前途”的承诺上,另一面则将自身确定在自由国家对个体的正义的承诺上。<sup>9</sup>

资本主义和自由国家,这些西方现代性的特点,受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攻击。然而,从后现代思想家的观点来看,这些批评与攻击并不足以深刻地打击现代对理性的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跟资本主义和自由国家一样,都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攻击的标靶。后现代主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统治意志仅仅被转变为集体的水平,即无产阶级掌握历史的意志。这一意志背后的合理性在20世纪已不复存在,当时它已表现为庞大的官僚政治国家,其中前苏联为第一典型。来自独断的个人意志和资本主义腐蚀逻辑的威胁

---

7. 尤见Derrida,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Eyes of Its Pupils," *Diacritics* XIX (Fall 1983), pp. 7ff.

8.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 Vol. 39, *Gesamtausgabe*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0), p. 23 和 *Hölderlin's Hymnen "Der Ister"*, Vol. 53, *Gesamtausgabe*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4), p. 59.

9. Jean François Lyotard, "Rules and Paradoxes and Svelte Appendix," *Cultural Critique* 5 (Winter 1986—1987), p. 215.

应当得到抑制；但是抑制者本身也会变成一种新的威胁。把工人从资本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承诺最终不过是使意志和理性的螺丝又拧紧了一圈。[3]

对现代根基的质疑已经不再仅仅是发生在学术教科书上的事情了。后现代声称，在这以外的社会同样发生着这种现象。然而，确切地说发生了什么，达到什么程度，这还是个争论的问题。后现代性这一术语的应用似乎暗示了，现代认知和社会结构已经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足以称之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过这个说法可能显得过于强硬。可能绝大多数人更愿意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变化正在把我们置于一种“后现代的现代性”的境地中。<sup>10</sup>这表明我们的现代性被诸多现象撕裂了，而这些现象在我们熟悉的认知和社会结构范围内是不易理解的。如果说“后现代性”这个术语是尴尬的、模糊的，那么此术语所声明要描述的社会现实同样也是尴尬的、模糊的。<sup>11</sup>

为强调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想使用“后现代的问题性”这个术语来指称这里所讨论的现象。这一问题性由四类相关的现象组成：对元叙事渐增的不信任，对社会合理化所造成的新问题的逐渐警觉，新信息技术的爆炸和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总之，这些现象构成了一个不确定的混合体，其中挑战、困境与机遇并存。这些现象也为当代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反思提供了独特的语境。<sup>12</sup>

---

10. 我这里所用的是威尔士那本很有用的书：Unser postmodernes Moderne 标题的一部分。

11. 德里达坚持认为，今天一切亲密的、亲爱的事物都没有了安全感，它们都在不停地颤抖着。见德里达文章“The Ends of Man”，见 *Margins of philosophy*, Alan Bass 编译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133. 关于让福柯在分析模糊性的时候获得灵感的具有指导性的著作，参见 William Connolly, *The Politics of Ambigu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12. 我对“后现代的现代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不应该被理解成对自